目　录

李大钊 ……李　新（1）

邓恩铭 ……周庆本　王晓梵　李海青（42）

陈赞贤 ……刘勉玉（103）

贺　龙 ……北京体育学院《贺龙》编写组（126）

夏明翰 ……蒋　薛　吕芳文（263）

袁文才 ……陈培均　吴直雄（285）

附　录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章程 …… (31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李　大　钊



邓　恩　铭

China



贺　　龙



陈　赞　贤

China



夏　明　翰



袁　文　才

China

本 卷 前 言

本卷收入了六位党史人物的传记。李大钊、邓恩铭是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同志一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从容壮烈地牺牲在军阀张作霖的绞刑架下。他的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章，为党的事业慷慨献身的高风亮节，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

邓恩铭、陈赞贤都是党的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他们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历尽艰辛，出生入死，深受广大工人群众爱戴。他们是最早一批牺牲在蒋介石屠刀下的英勇的共产党人。

贺龙同志是名震中外的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光荣的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是百战沙场、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一片丹心。不幸在十年浩劫中被林、江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含冤九泉。我们今天重读贺龙传，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我们要永远学习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子孙、党的忠诚战士的优良作风。

夏明翰、袁文才是工农运动的领袖，人民起义的领导者。袁文才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英雄。夏明翰悲壮的就义诗，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伟大民族的子孙万代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　　※　　※

这些传记的编写者，多数是年轻的党史教师和革命纪念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工作者，不是专业作家。我们的写作水平不高，接触到的资料有限，年月日、人地名，某些情节，难免有错漏。但我们是怀着无限崇敬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心情来从事采集资料和编写的。我们衷心希望以此为张本，征求知情同志们的指教。

胡　华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李 大 钊*

李 新

李大钊于1889年10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阴历十月初六）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两岁丧父，三岁丧母”（见英文自传，岁数系虚岁），“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狱中自述》），孤苦伶仃，靠老祖父抚养成人。他的祖父李如珍，是个读书人，虽然只有薄田九十余亩，家境并不富裕，但他还是要把孙儿送去读书，希望通过科举，扬名显亲。

李大钊自幼勤学，在塾中读四书经史，成绩优异。1905年，他到永平府去应试，虽然考中了，但因科举停办，只好到永平府中学读书。永平府中学毕竟是个洋学堂，李大钊在这里读洋书，不仅接触到“新学”，打开了眼界，而且可以和相知的同学议论国家大事，共同研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他对康、梁的文章很赞赏，经常手不释卷。

1907年，李大钊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从预科到

---

*本文原系在李大钊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稿，曾以《研究李大钊学习李大钊》为题，在《人民日报》上摘要发表，收入本书时，根据原报告作了些必要的删节。

正科，直到1913年毕业。在这个期间，他看到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他的老师白毓崑因参加滦州起义壮烈牺牲，牺牲时立而不跪，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白毓崑的英雄气概，使年青的李大钊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辛亥革命以妥协告终。袁世凯的窃国引起了李大钊对共和国的"隐忧"和"哀痛"，为此他写下了《隐忧篇》和《大哀篇》。这时的李大钊，已经由一个普通的爱国学生进而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了。

1913年冬天，李大钊得到汤化龙等人的资助，到日本去留学。出国前，他在纪念友人郭厚庵的一首七律诗中，表达了他对祖国命运的无限关怀：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熏。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李大钊诗浅释》）

李大钊到日本后，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他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正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的时候。1914年，他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开始进行反袁的活动。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袁世凯想当皇帝的急切心理，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留日学生群起反对，公推李大钊为留日学生总会的文牍干事，起草通电，反对卖国条约。他连夜写成了《警告全国父老书》。这篇激昂慷慨、脍炙人口

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对当时的反日爱国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权欲熏心的袁世凯，为了要过皇帝瘾，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在哀的美教书的威胁下，于5月9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6月，李大钊又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并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激励全国人民，继续坚持斗争。就是在这次爱国斗争中，李大钊成了闻名一时的人物。为了反袁，他曾于1916年1月返国，2月又回日本。当1916年春，他到江户送友人幼蘅回国的时候，护国战争已着着胜利，他以无比的热情口占一绝，对反袁斗争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酒，高筑神州风雨楼。

（《李大钊诗浅释》）

为了促使袁贼灭亡，李大钊等不及毕业，就于当年5月，回到上海，投入火热的反袁斗争。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下，那个予毒予雄、不可一世的袁世凯，仅仅做了一场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就一命呜呼了。袁世凯虽死，但继起的是段祺瑞，这只北洋军阀之“虎”，其卖国残民的手段，比袁氏毫无逊色。

还在回国之前，李大钊于1916年春在日本写成了以《青春》为题的文章，寄给陈独秀，发表在当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一号上。从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的思想和文风有更新的进展。他前此的诗文，于慷慨激昂中间有悲凉的音调，而《青春》中所表现出来的多半是明快而雄壮

的旋律。它的思想清新，色调鲜明，它号召青年们要“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要“乘风破浪”地前进，“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见《李大钊选集》。以下引文不再注）。文章气势磅礴，声音宏伟，足以振聋发聩。这篇文章和他以后在1918年春天发表的《今》、《新的·旧的》等文章，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又充满了辩证法的因素，为他从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16年6月，李大钊应汤化龙等人的邀请，到北京去办报。这个报纸由他取名为《晨钟》，并担任总编辑。他的目的，想振此“晨钟”，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以为“青春中华之创造”。但研究系汤化龙等人的目的，不过是想利用李大钊的文名，为他们装点门面，收买人心而已。由于李大钊与他们有过去的关系，而他们这帮政客在袁世凯快要垮台的时候，也曾经投机反袁，李大钊这时还未能看穿他们的本质，所以才去与他们合作。随着时局的发展，李大钊抨击军阀的言论愈来愈激烈，渐为研究系政客所不容；而研究系政客甘当军阀工具的面目更加暴露，也为李大钊所不齿。关系终于破裂了，李大钊只干了二十二天，就于9月5日，毅然决然地、十分沉痛地离开了他亲手创办的《晨钟》报。

1917年1月，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在北京出版，李大钊受聘为编辑。他不顾章士钊的劝告，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了许多反对军阀统治和反对封建文化的文章。特别是对孔教的批判，不但很激烈，而且很深刻。他认为“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孔丘所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道德是

China

必然要崩溃的。同时他也认识到批判孔丘所代表的旧道德，“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是要冒很大的危险的。1917年7月上旬，落后的中国，又演了一出“张勋复辟”的丑剧。李大钊不得不避走上海。他在“淹滞沪滨”的时候，“百感交集”，从下面这首于秋天寄给白坚武的七律诗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沉痛的心情：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繁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江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

（见白坚武日记，白后来当了汉奸）

这时的李大钊，非常苦闷，他在反省，在思索，他的愤激之情，无语可表，因而写出了似乎消极的词句，其实他是在探求新的革命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是中国首先接受马列主义的第一人，但他接受马列主义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1918年1月，李大钊由章士钊推荐，接替章担任了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这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从1915年9月就创刊的《青年杂志》，于1916年改为《新青年》，早已成为新文化的旗帜。因主办《新青年》而享有盛誉的陈独秀这时正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从前为《新青年》写过文章，他一到北京大学，就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部。他在北京大学，一面研究理论，写文章，一面到师生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职工群众中去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北京大学各种社会团体的名册中，大半都有他的名字，甚至连“学生游艺大会”、“学余俱乐部”，他也是发起人之一。

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比他前一年的文章进步多了。在这篇文章里，他明确地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根本区别，指明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这篇文章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还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行演讲大会，著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了《劳工神圣》的演说。为什么蔡元培能发表这样的演说呢？因为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全世界工人运动高涨，不但十月革命的成果保住了，而且革命潮流汹涌澎湃，大有席卷全球之势。同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在大战中得到迅速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了。因此崇拜劳工的时代潮流，得以传入中国。资产阶级在它取得政权之前的上升时期，是需要无产阶级的。众所周知，蔡元培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早年还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所以他这时发出“劳工神圣”的呼声是不足为奇的。这表明他办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的方针，并非不偏不倚，而是倾向于进步的。继蔡元培演讲之后，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这篇著名的演说（后来又写成文章发表）。接着，他又发表了著名的论文《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篇文章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和世界革命高潮的鼓舞下，针对那些欢呼协约国战胜同盟国为公理战胜强权的人们而写的。因为当时的北京政府，下令于11月14日至16日放假

三天，大举庆祝参战胜利。李大钊针对那参战年余而未出一兵一卒的将军段祺瑞，对那先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梁启超之流，感到无比气愤。他透过喧嚣的锣鼓声和凯歌声，听到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庶民群众对胜利的欢呼。他向中国人民指出：这次胜利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而一切历史的残余——皇帝、贵族、官僚、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要被群众的革命巨流彻底摧毁，“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的眼光是多么的远大，他的声音是多么的响亮啊！这两篇文章虽然没有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但它们的立场十分鲜明，不仅和帝国主义、军阀、官僚针锋相对，就是和蔡元培高唱劳工神圣的立场也迥然不同，它们已经是在为无产阶级说话了。可以说，这时的李大钊已经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通过幸德秋水、河上肇等人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那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和他本人的亲身经历，使他不可能立即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到1918年秋后，世界的革命形势，中国的社会状况，使饱经忧患之后的李大钊，经过深刻的反省、探索和认真的学习、研究，才终于找到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救国救民的真理。

从1918年下半年起到1919年，随着国内外形势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北京(以至全国各主要城市)，各种爱国团体、新文化团体和传播新思潮的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由于李大钊极其热情地参加、支持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北京各团体差不多都请他去指导或当顾问。例如1918年6月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其中如曾琦等倾向国家主义的人颇不少，但

因李大钊是七个发起人之一，并在初期担任了《少年中国》的编辑主任，而且随后又有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高君宇等参加进去，所以在五四时期，它主要是起了进步作用。由于它的人数较多，分布较广，因此影响也较大。至于它的分化，那是以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事了。又如1918年10月成立的国民社，它是由反对中日密约的学生救国会发展而成立起来的。它一开始就请李大钊任导师。他不仅积极为《国民》撰稿，而且实际上是这个杂志的总顾问。在李大钊正确的指导和影响下，国民社的多数成员，特别是它的骨干分子如许德珩、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在随后的五四爱国运动中成为积极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和国民社差不多同时成立的新潮社，由傅斯年、罗家伦等人负主要责任，他们受胡适的影响较大，因而后来向右翼发展的人较多。但因李大钊当时被学生们公认为最接近他们的导师，就连新潮社也于12月聘请他为顾问，并约他为《新潮》写稿。特别是当五四爱国运动期间，胡适不在北京，陪着他的老师杜威到全国各地去贩卖实验主义哲学，这时新潮社的人，基本上是随着李大钊的指导前进的。至于由邓中夏等发起，以左翼学生为主，于1919年3月成立起来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它与李大钊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

1918年1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特地创刊了《每周评论》，这是因为《新青年》每月一期，多半是长篇文章，已不能完全适应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了。《每周评论》登的是短文，着重批评时政，推动当前的政治斗争。1919年元旦，李大钊写了一篇社论，题名《新纪元》。这篇文章主张劳工阶级联合起来，“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要“一步一步的

China

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同年 2 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晨钟》第七版（副刊）设立了“自由论坛”，作为新文化的园地，他在这上面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性的文章。这时，帝国主义分赃的巴黎和会正在进行着。平民教育讲演团从 4 月起，就开始跨出校门、走上街头去宣传，“抵抗强权”、“争回青岛”的呼声，随时振动北京市民的耳鼓。这时，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已经在频繁地议论他所提出来的“直接行动”的问题。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不受反动法律限制的革命行动。爱国的青年志士们正在跃跃欲试，革命的暴风雨即将到来了。

1919 年5 月 4 日，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没有统一的和严密的组织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次自发的群众运动。但是，它受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受世界革命高涨的影响，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五四当天，身为大会指挥之一的傅斯年，害怕游行的群众“越轨”，曾极力阻止队伍向东单曹宅前进。但是，各派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积极分子，带领着游行队伍，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创造了火烧赵家楼这一页壮烈的历史。五四运动也没有接受资产阶级发出的“文明抵制”、“切勿暴动”等劝告，而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罢课、罢工和罢市，终于取得了罢免三个卖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伟大胜利。五四运动是按照左翼的方向前进的，右翼的分化是后来的事。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都在不同程度上起了领导的作用和骨干的作用。毛泽东在湖南、恽代英在湖北、马骏（二十年代末期背叛了共产党）、周恩来在天津，都是大家公认的运动领袖。至于李大钊对五四运动所起的领导作用，既有他自己当

China

时所写的文章在，又有当事人后来所写的回忆在，无数铁的事实可资证明，任何人想抹杀都是办不到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所有这些经过精辟分析的科学论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证明其正确，愈益为人们所承认，因为它是从纷繁的历史现象中发掘出来的客观真理，需要进行认真的思考才能深刻的理解。

就在5月4日那天，《每周评论》第二十号出版了。它把帝国主义的巴黎和会与南北军阀的上海和会都称作分赃会议，说“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仅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五四运动爆发后，《每周评论》以特大号字体为标题，报道运动的发展。为了营救被捕的学生，李大钊到各处奔走；为了挽留辞职的蔡元培，李大钊向各方呼号。5月18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提出要“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为运动指出了远大的政治目标。6月3日以后，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学生走入工人中去了，李大钊在“五四”前发出的“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号召，产生了实际的效果。6月11日，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到外城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当被捕学生已获释、三个卖国贼已被罢免之际，《宣言》为人民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推动了运动的发展。陈独秀在“新世界”游艺场散传单时被捕，李大钊极力营救。这时，胡适乘机把持了《每周评论》，一连两期几乎以全部篇幅刊登了杜威的讲演录，妄图借此把运动冷下来。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字的日期。李大钊

全力支持反对签约的斗争。他把《每周评论》夺回来，在二十九期上写了许多呕心沥血的短评。这些文章，就是现在读起来也会令人感动。无怪它在当时能激励广大群众去斗争，逼使北洋政府于 30 日公布我国专使未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电报。

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为着革命斗争的需要，李大钊更加勤奋地钻研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 年一整年，他发表了好几十篇文章，不到一星期就写成一篇。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到思想道德问题；无论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举凡工人的生活、农民的疾苦、青年的教育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如士兵问题、面包问题、失业问题、自杀问题、废娼问题等等；其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写。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长篇论文为最重要。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

在宣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不能不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众所周知，李大钊于 1919 年 6 月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对胡适鼓吹的一点一滴地改良、反对根本改造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驳得体无完肤。此后，他对各种反动思潮，结合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进行批判。他的文章如同他的为人一样，观点是鲜明的，态度是和平的，总是从正面阐明道理，很少用尖刻挖苦的词句。就是对别人的讽刺谩骂，他也是置之不理而已。这样以理服人，效果反而更大。

1919 年 9 月，经李大钊等人的营救，陈独秀从狱中释放出来。陈独秀受法兰西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太深，所以他接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